

印度对“印太”的参与、局限与展望

——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

黄郑亮**

【内容提要】 近年来，“印太”逐渐从地理概念升级为地缘政治战略。国家间底层产业链关系的稳定与否是“印太”战略能否有效落地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全球价值链的环境下，印度通过与“印太”核心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投入—产出关系形成了“印太”产业关联。印度在其中的角色为“生产者”，上承原料供应、下接需求市场。但是，受制于印度制造业的结构性缺陷与国内产业体系的不完善，印度“生产者”的角色更多地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仅处于“印太”核心产业的边缘，而且难以有效承接区域内产业转移。这就限制了印度对“印太”的经济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太”战略的落实。目前，印度国内正在通过经济改革改善制造业落后的不利局面，同时，在国际层面印度也在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与对接国际产业合作的双重手段为“印度制造”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 印度 印太 全球价值链 产业结构 莫迪改革

DOI: 10.16608/j.cnki.nyyj.2022.02.06

作为印太地区的大国，印度对印太地区长期保持着战略野心。在2017年美国正式出台“印太战略”以后，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交往合作日益密切。但是，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家间的产业互动关系是构建

* 本文是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印太战略下‘东盟中心地位’重构与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145）与“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0DZA099）的阶段性成果。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基础，也是决定国际合作能否深入与持久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测算印度与印太核心国家的投入—产出关系与产业分工关系，认为印度的理想角色是作为区域内的“生产者”，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形成产业关联。然而，在现实中，印度却面临着国内产业结构不完整、国际生产“替代”能力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印度整体生产能力的不足，从而制约了印度对“印太战略”的参与能力。为此，印度试图通过莫迪经济改革，保护脆弱的国内市场，并致力于扩大“印度制造”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份额。

一、印度参与“印太”建构的背景

作为“印太”框架下的重要国家，近年来，印度对“印太”的参与热情逐步提升，不仅能够在“印太”下找到与相关国家的共同战略诉求，而且能够扩展与“印太”国家的经济合作空间。

（一）印太：从概念到战略建构

“印太”一词随着美国“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的出台而甚嚣尘上，成为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印太”的概念最早由20世纪20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提出。在《太平洋地政学》（1924年）、《地政学基础》（1928年）、《印度太平洋空间中的德国文化政治》（1939年）等著作中，豪斯霍弗把“印度太平洋”概念作为其“海洋政治学”的理论支柱。豪斯霍弗的“印太”观点，与当时的“欧美”观点形成对立。其背景是一战后德国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豪斯霍弗期待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内被殖民国家在政治上的复苏，驱逐“欧美”列强的全球影响力。尤其是面对美国势力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他极度担忧美国在进驻菲律宾后会在太平洋复制出英美主导的海洋走廊，因此极力盼望“印太”能在海洋上自主崛起，打破老牌航海国家的海洋垄断，实现海洋自治。^①豪斯霍弗的“印太”提法虽然有着列强争霸的时代背景，是为了濒临衰落的德国全球利益而服务，但是在客观上，豪斯霍弗却把“印太”的地理意义上升为“地缘政治”含义，这也为今天“印太战略”的提出做了早期的理论铺垫。

^① 李汉松：《重思“印太”概念的前世今生》，澎湃新闻，2020年12月2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533218

2007年以后,“印太”逐渐从概念向国家战略层面转化。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访印期间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到,日本外交要在欧亚大陆的外缘形成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the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印度将是这一目标的主要合作伙伴,还要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纳入其中。^① 安倍的演讲得到了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赞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即发端于此。^② 2017年,随着特朗普总统的上任,美国的关注重点从中东逐渐转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这也带动了“印太”进入实质性的“战略”建构时期。在当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特朗普提出“印太梦想”(Indo-Pacific dream),并呼吁“让我们共同努力,实现一个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印太。”^③ 2017年以后,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多份战略性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7年)、《印太战略报告》(2019年)、《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2019年)等。这些报告共同形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指导性文件,意欲强制性扭转正在出现的不利于美国的国际格局,进一步重塑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分配规则和亚太地区秩序,以重新获得“美国优先”的能力。^④ 随后,美国总统乔·拜登认为在“印太战略”下,美国需要与印太地区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合作。^⑤ 2021年,拜登政府成立后,在“印太战略”下落实自己的盟友策略,开始构建一系列新的小多边主义组织,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签订的“三边安保联盟协定”(AUKUS)和美国、印度、阿联酋、以色列的“四方安全对话”。

在“印太”的战略规划中,印度占有重要地位。而印度本身对“印太”的建构抱有欢迎态度,印度寄希望于“印太”实现自身在印度洋与太平洋

①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Shinzo Abe’s Speech 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October 26, 2007.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② 叶海林:《“印太”概念的前景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2期,第3页。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U. S. Mission to ASEAN, November 10, 2017. <https://asean.usmission.gov/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④ 朱翠萍:《“印太”:概念阐释、实施的局限性与战略走势》,《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5期,第3页。

⑤ Joseph R.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April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的“战略自主权”和“包容性”。^① 2018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主旨演讲，表达了对“印太”的看法，并首次阐明对“印太”的参与愿景，将其置于印度与世界互动的核心。^② 在印度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对“印太”的提法逐年增多，2018~2019年度“印太”出现了22次，2019~2020年度“印太”则出现了59次，^③ 印度领导人不仅多次在国际场合表现出“印太”的热情，而且也“对‘印太’地区进行着独特的规划”。2019年11月，在第14届东亚峰会上，莫迪总理提出了建立“印太海洋倡议”（Indo-Pacific Ocean Initiative, IPOI），这一倡议的目标在于构建区域内利益相同国家的伙伴关系，以促进自由贸易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民主治理模式以及基于规则的贸易秩序将是这一倡议的主要抓手，而在这一目标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也将得以加强。可以说，“印太”的出现，为印度提供了“走出南亚、进入亚太、向世界性大国看齐”的有利机遇。

（二）印度参与“印太”建构的经济考量

从各方对“印太”的解读来看，“印太”不仅包括区域政治和安全秩序建构，而且“印太”背后的经济考量也不容忽视。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对印太地区的愿景就包括经济领域的“公平互惠的国际贸易、开放的投资环境、国家间透明的合作协议”，^④ 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太海洋倡议”中也提出了区域内的经济繁荣和自由贸易。“印太”的经济意义是印度洋和太平洋已经同属于一个区域系统之中，这意味着地缘经济格局已经发生质变，

^① Jagannath Panda, “The Strategy Imperatives of Modi’s Indo-Pacific Ocean Initiative,” April 8, 2020.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publications/the-strategic-imperatives-modi%E2%80%99s-indo-pacific-ocean-initiative>

^② Rahul Roy-Chaudhury, “Strengthening Maritime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in the Indian Ocean,” IISS, September 6, 2018.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18/09/maritime-cooperation-indian-ocean>

^③ “Annual Report 2018-2019,”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http://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31719_MEA_AR18_19.pdf; “Annual Report 2019-2020,”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http://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32489_AR_Spread_2020_new.pdf

^④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Department of Defense, Government of USA, June 1, 2019, p. 2.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使得原来彼此独立的两个经济区块融为一体。^①对于印度来说,“印太”建构的经济考量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印度成为印太地缘经济下的重要一环,而印太也为印度提供了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平台。印度经济的崛起,带动了南亚地区经济重要性的提升,改变了传统的“太平洋—印度洋”地缘经济结构,促使“亚太”概念开始向“印太”概念进行扩展。2020年,印度GDP为2.6万亿美元,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七,同时,在2000~2020年的时间里,印度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82%,远高于同期世界各国GDP平均增长率的2.79%。^②正是在体量和增速的保证下,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成为印太地区经济秩序构建中不可忽视的国家,也为印度提供了参与“印太”区域事务的经济能力。但是,在新冠疫情的打击下,印度经济却出现了大幅衰退,2020年经济增长率为-7.25%。^③印度领导层认为对特定经济体的过分依赖,削弱了经济的抗风险能力。2021年5月,印度外长苏杰生指出:“为了应对新一轮病毒全球大流行,必须构建分散且具有灵活性的供应链,印度目前正在和日本、澳大利亚共同致力于(避免生产基地集中于中国等的)供应链弹性倡议(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④因此,印太地缘经济将为印度提供未来供应链多样化、弹性化的平台。

其次,“印太”在印度对外经济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太地区经济体是印度对外贸易、外资引入的主要伙伴。从广义上看,“印太”包括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袤区域,而从狭义上看,印度前驻美大使尼鲁帕玛·拉奥琪认为,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洋空间延伸是“印太”的中心,其包括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菲律宾海和西太平洋。^⑤在新冠疫情暴发

① 杨怡爽:《“印太”的经济逻辑辨析》,《国际展望》,2019年第2期,第86页。

②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计算所得。<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IN>

③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IN>

④ 《印度外长:构建可应对危机的供应链》,日经新闻网,2021年5月24日。<https://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viewpoint/44828-2021-05-24-10-37-34.html>

⑤ Nirupama Rao, “America’s ‘Asian Pivot’: The View from India,” Two Circles, February 6, 2013. http://twocircles.net/2013feb06/india_welcomes_us_asia_pivot.html

前的2019年,这一地区^①在印度的对外贸易格局中占印度总进口的46%、总出口的40%,^②涵盖了印度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而从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个“印太”支点国的角度来看,这为印度提供了一个开拓出口市场、改善贸易不平衡、吸引外资投入的机遇。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之一,2019年对外贸易的总逆差额超过1500亿美元,但是在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的贸易往来中,印度反而能够获得3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大大改善了印度贸易不平衡的趋势。其原因就在于三国在印度的出口和进口的贸易结构中,分别占据了20%和11%的份额,其中,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出口市场,占印度总出口的17%左右;^③与此同时,在2019年,日本和美国分别是印度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第四和第五大来源国,其投资额度分别为28亿美元和27.9亿美元。^④因此,“印太”能够为印度提供参与世界经济互动的平台,而与“印太”支点国的经贸联系则符合印度扩大出口、引进外资的经济利益。

最后,在“印太”建构的共同诉求下,印度能够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开展更大范围的双边合作关系。其中,印度与美国的经济合作表现为“多领域、全方位”。在2019年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美国提出了对美国—印度扩大经济合作的期待,指出美国与印度将在防务采购、基础设施联通、能源开发中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而且双方还将投资15亿美元用于未来的太空开发项目中。^⑤印度与日本的合作则集中于区域发展规划的协同。2016年11月,印度总理访问日本时,印日双方决定在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与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 PQI)之间寻求政策协同;^⑥2017年,印度与日本又联合提出了“亚非增长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AAGC),以加强印日两国在共同帮助开发非洲经济增长方面的合作,旨在沟通亚洲和非洲的经济联系。与印美、印日双边关系相比,印澳关系则是“印太”下最薄弱的环节。印澳经贸联系并不密切,彼此的经济诉求也较低,但是

① 这一地区指“印太”区域内的东亚、东南亚、北美洲、大洋洲的所有国家。

② UNCTAD数据库。<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③ UNCTAD数据库。<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④ IBEF。<https://www.ibef.org/economy/foreign-direct-investment.aspx>

⑤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 10.

⑥ “Annual Report 2016-17”,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p. Xi. http://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29521_MEA_ANNUAL_REPORT_2016_17_new.pdf

在“印太”的框架下，印澳两国正在努力提升双方发展战略的对接。2018年7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印度经济战略2035》，提出要在2035年之前将印度提升为澳大利亚的三大出口市场、亚洲第三大外资投入目的地，并把印度作为澳大利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①作为回应，2018年11月，印度总统科温德对澳大利亚完成了历史性首访。2020年12月，印度工业联合会发布《澳大利亚经济战略报告》，指出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经贸合作将有着世界性的意义，除了在传统的能源领域外，印度还将在钻石、制药、汽车配件等新兴领域大力开拓与澳大利亚的伙伴关系，以释放两国的合作潜力。^②

总体来看，“印太”战略的出台，为印度提供了参与印太区域内经济建设的机遇，也有利于印度以区域内大国的身份获取更多的战略合作利益。那么，现实中的印度能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印太”支点国家打造有效的经济联系以支撑经济基础之上“印太”战略的构建呢？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为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全球价值链从国家间底层产业关系出发，以生产分工和增加值贸易为核心，形成研究国际关系的新思路。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活动，“描述的是一项产品从理念到最终使用的一系列过程，包括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售后等环节。”^③印度能否与印太国家构建稳定的“印太”战略，核心问题在于印度能否与“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打造底层产业分工关系，从而形成“印太”区域下的共同利益。为此，本文将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为视角，探索印度在“印太”框架下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价值链关系，并对印度自身的价值链参与能力和发展前景做出分析。

二、印度参与“印太”建构的全球价值链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中，以生产为视角的“投入—产出”关联，是衡量国家

① “An India Economic Strategy to 2035,” Australian Government, July 2018, p. 5. <https://apo.org.au/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2018-07/apo-nid182661.pdf>

② “CIM Launches Australia Economic Strategy Report of CII,” Confederation of India Industry, December 2020. <https://www.cii.in/PressreleasesDetail.aspx?enc=cadAuP8ZcM0s4Oif a0cObyZrtfCa6eCRBlOlSk2blXk=>

③ [美]加里·杰里菲等：《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发展：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和政策分析》（曹文、李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指标,反映了国家间的产业依赖关系,各国通过生产分工而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国际生产网络。同时,以“增加值”为单位的价值链测算,则体现了国家间在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关系与不同的任务分工关系。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投入—产出与产业分工关系,是印度与“印太”战略建构的价值链基础。

(一) 印度与美日澳的国际投入—产出结构

“国际投入—产出表”是目前可以准确反映国际产业关联的工具,不仅能够表述国家间不同产业分工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来计算一国某一部门生产中包含了多少其他部门的产品(包括国内和国外)。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制定源于“里昂惕夫逆矩阵”^①思想,其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对价值总值和生产要素的价值增值份额进行分解,^②从数量上系统地研究复杂经济实体之间以及各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国际投入—产出表中,横向的“行”代表某个部门的产出,其产出之和称为“总产出”;而纵向的“列”则表示对某个部门的投入,投入之和即为“总投入”,其中投入又分为中间产品投入和最终产品投入。^③对国际投入—产出表的解释可简化为:某个产业部门的总产出分别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形式投入进其他部门,这种投入也就是其他部门对产出部门的需求。目前,最为通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来自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④该表总共包含41个国家和地区共56项产业,通过追踪中间产品的投入方向,得到国家间围绕“中间产品投入—中间产品产出”和“中间产品投入—最终产品产出”双重关系。

^① 华西列·里昂惕夫(1906~1999),1973年因为开发出投入—产出这一经济学分析方法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分析方法的经济意义是:增加某一部门单位最终需求时,需要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提供的生产额是多少,反映的是对各部门直接和间接的诱发效果。因此,投入—产出表又称为“完全需要系数矩阵”或“里昂惕夫逆矩阵”。

^② 孙红燕、李欣欣、刘晴:《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增值测算的研究综述》,载《工业技术经济》,2017年第4期,第107页。

^③ “中间产品”是指为了再加工或者转卖用于供别种产品生产使用的物品和劳务,作为生产资料的投入预示着生产的跨国进行,或者说,不同国家和不同的生产部门,将通过中间产品的流动而被连为一个整体,这也是全球价值链框架下最基本的生产模式。而中间产品流动结束的标志,则是“最终产品”的产出,最终产品指一定时期内生产的而在同期内不再加工、可供最终消费和使用的产品,一般来说,最终产品主要包括消费品、固定资产和库存等基本形式。

^④ WIOD数据库是目前包含国家最多、产业最为齐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在WIOD以外还有区域性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包括亚洲开发银行旗下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IOTs)、欧洲“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EIOD)等。

通过对印度 2014 年总产出的分解,^① 可得出印度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的投入, 即三国对印度产出的需求。从产出产业来看, 印度的“纺织、皮革制品”、“化工产品”^② 和“成品油”^③ 是与三国需求关联最强的产出部门, 这三个部门均位列印度对三国总产出的前三位。其中, “成品油”主要作为中间需求投入三国, “化工产品”则主要投入美国, 而“纺织、皮革制品”则主要作为最终需求投入美国和日本两国。不仅如此, 从三国的整体需求角度来看, 三国对印度中间产品的需求大于对印度最终产品的需求, 但是美国对印度最终产品的需求比例要明显高于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这就说明: 以“纺织、皮革制品”、“化工产品”和“成品油”为代表的印度对三国产出, 将主要作为零部件、原材料、半制成品等中间产品而被三国用来继续生产。同时, 美国的庞大消费需求也导致印度对美国的投入有着超过 40% 的比例用来最终消费, 这种最终消费需求主要来源于“纺织、皮革制品”(见表 1)。

表 1 印度产出与三国投入分解 (2014 年)

(单位: 百万美元)

印度产出产业	对美总投入金额	占比 (%)	美国中间需求金额	占比 (%)	美国最终需求金额	占比 (%)
全部	36547	100	21495	58.81	15052	41.19
纺织、皮革制品	7555	20.67	989	13.09	6565	86.90
化工产品	4822	13.19	4447	92.22	375	7.78
成品油	4707	12.88	3565	75.74	1142	24.26
印度产出产业	对日总投入金额	占比 (%)	日本中间需求金额	占比 (%)	日本最终需求金额	占比 (%)
全部	5644	100	3831	67.88	1814	32.14
成品油	1826	32.35	1366	74.81	461	25.25
食品、饮料、烟草	595	10.54	213	35.80	382	64.20

① 说明: 由于统计数据的复杂性, 目前 WIOD 数据库仅更新至 2014 年, 鉴于产业关联形成后的稳定性, 基本可以反映印度近年来的产业概况。

② 在印度的进出口贸易中, 化工产品以“药物”为主要组成部分。

③ 成品油指消费用油, 通过催化、裂化和分馏等工艺从原油中提炼, 包括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

印度对“印太”的参与、局限与展望

印度产出产业	对澳总投入金额	占比 (%)	澳大利亚中间需求金额	占比 (%)	澳大利亚最终需求金额	占比 (%)
全部	2703	100	1686	62.38	1018	37.66
纺织、皮革制品	673	24.90	412	61.22	261	38.78
机动车辆制造	255	9.43	75	29.41	180	70.59
成品油	228	8.44	174	76.32	54	23.68

数据来源：WIOD 数据库。https://www.rug.nl/ggdc/valuechain/wiod/wiod-2016-release

注：总投入占比=细分产业投入金额/总投入金额，中间需求占比=各产业中间需求金额/各产业总产出金额，最终需求占比=各产业最终需求金额/各产业总产出金额。

与此同时，观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对印度的投入可发现美国对印度投入较为综合，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领域；日本对印度投入主要为制造业；而澳大利亚则主要集中于能源产业。与此同时，三国对印度的投入主要表现为中间产品的投入，尤其是澳大利亚，对印度中间产品的投入甚至超过了 90%。而对三国总产出进行产业细分可发现三国产出产业较为分散，只有“基础金属”^① 一项位列产出产业的前三位，主要作为印度生产的“中间需求”存在，其中间需求比例超过了 99%，其他诸如“土木工程活动”、“化工产品”、“矿产能源”、“批发贸易活动”等部门对印度中间需求的投入比例也均在 90% 以上。这也就预示着，三国对印度的投入以中间产品为主，将主要作为印度保持生产的供应来源，特别是能源、化工、土木工程、批发贸易等部门，将为印度钻石制造业、炼油业、药品制造业、纺织业等产业提供生产必需的能源、原材料与配套的生产性服务（见表 2）。

表 2 2014 年三国产出与印度投入分解

(单位：百万美元)

美国产出产业	对印总投入金额	占比 (%)	印度中间需求金额	占比 (%)	印度最终需求金额	占比 (%)
全部	16233	100	11713	72.16	4520	27.84
化工产品	1862	11.47	1720	92.37	142	7.63

^① 基础金属在印度的对外贸易中主要表现为“钻石”原材料——碱性金属，即元素周期表中的六个金属元素：锂 (Li)、钠 (Na)、钾 (K)、铷 (Rb)、铯 (Cs)、钫 (Fr)，在自然界中，碱金属大多以锂辉石、锂云母、红云母等矿石形式存在。

土木工程活动	1829	11.27	1829	100.00	0	0.00
基础金属	1536	9.46	1535	99.93	1	0.07
日本 产出产业	对印总 投入金额	占比 (%)	印度中间 需求金额	占比 (%)	印度最终 需求金额	占比 (%)
全部	8031	100	6277	78.16	1754	21.84
基础金属	2288	28.49	2274	99.39	14	0.61
机械装备	1097	13.66	434	39.56	663	60.44
金属制品	898	11.18	739	82.29	160	17.82
澳大利 亚产出产业	对印总 投入金额	占比 (%)	印度中间 需求金额	占比 (%)	印度最终 需求金额	占比 (%)
全部	7844	100	7431	94.73	383	4.88
矿产能源	3941	50.24	3940	99.97	1	0.03
基础金属	1909	24.34	1906	99.84	3	0.16
批发贸易	478	6.09	440	92.05	38	7.95

数据来源：WIOD数据库。

注：总投入占比=细分产业投入金额/全部总投入金额，中间需求占比=各产业中间需求金额/各产业总产出金额，最终需求=各产业最终需求金额/各产业总产出金额

根据“国际投入—产出”，印度与三国的产业关联概况可表述为：印度对三国的需求主要集中于基础金属、矿产能源等“中间产品”，大多具有原材料的属性，是印度钻石产业、医药产业和能源产业的原料来源，其原因在于印度国内相关资源缺乏，从而在实际生产中对三国原料供应的依赖性较强。而印度对三国的投入则以纺织、化工、炼油等产业为主，其中，纺织、皮革类产品形成三国的“最终需求”而被消费，其余产品则以“中间产品”的形式而进入三国的生产领域。从这一流程大致可以看出，印度与三国的产业关联，除了纺织产业表现为单次跨越国境的“简单价值链”关系外，其余大多数产业均表现为“进口原材料—深加工—出口加工制成品”的“复杂价值链”关系。

（二）印度与美日澳的产业分工关系

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一种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各国在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决定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角色与所承担的不同任务。目前，学术界已经形成了测算一国的某个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模型，^①其中最

^① Robert B. Koopman and Zhi Wang,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Working Paper Seri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USA, September 2010, p. 21.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16426/w16426.pdf

重要的是“前/后向关联指数”和“位置指数”模型：

$$GVC(\text{forward participation})_{ir} = \frac{IV_{ir}}{E_{ir}}$$

$$GVC(\text{backward participation})_{ir} = \frac{FV_{ir}}{E_{ir}}$$

$$GVC \text{ position}_{ir} = \ln\left(1 + \frac{IV_{ir}}{E_{ir}}\right) - \ln\left(1 + \frac{FV_{ir}}{E_{ir}}\right)$$

在这三个模型中， IV_{ir} 表示 r 国 i 产业出口的“间接增加值”，即 r 国 i 产业的中间品出口到第三国被第三国再加工并继续出口后获得的增加值； FV_{ir} 表示 r 国 i 产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即 r 国 i 产业的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部分； E_{ir} 代表着 r 国 i 产业的总出口增加值；而 $\frac{IV_{ir}}{E_{ir}}$ 和 $\frac{FV_{ir}}{E_{ir}}$ 则分别指 r 国 i 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关联度”和“后向关联度”。其中，“前向关联度”高，则表明 r 国的 i 产业主要向世界其他国家的生产提供“投入品”，包括初级产品和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以至于该产业的增加值也反映在第三国的出口中；与之相反，如果“后向关联度”高，则表明 r 国 i 产业的生产需求更多的外国中间产品和初级产品，反映在数据上即“国外增加值”比例较高。“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的对数比例则反映了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数越高代表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越处于上游位置，反之则越处于下游位置。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位置的国家一般掌握着“研发”和“供应”两大环节，而位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的国家则一般负责生产、加工、装配等环节。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提供了测算全球价值链的一系列指标，其中包括 2005 年至 2015 年间^①印度的总出口增加值、间接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依据这些指标，可发现印度“前向关联度”（即 $\frac{IV_{ir}}{E_{ir}}$ ）低于其他三国，而“后向关联度”（即 $\frac{FV_{ir}}{E_{ir}}$ ）则高于三国。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他三国，印度的生产需要更多的国外增加值，更依赖于上游产业的原料供应，而印度生产创造的间接国内增加值则较低，以至于对下游一系列产业影响有限（见表 3）。根据“前/后向关联”指数，可进一步计算

^① 与“投入—产出”统计类似，由于数据的复杂性，目前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仅更新至 2015 年，但是考虑到增加值贸易相对于一般性贸易更具有稳定性，这一统计基本能够反映印度的全球价值链位置。

出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分别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变化的趋势（见表4）。印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指数基本徘徊于0.04~0.15之间，其位置始终低于其他三国，这就说明印度大致处于三国的产业下游位置（见图1）。

表3 印度与美日澳三国的前后向关联指数

国家	指标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美国	后向关联度	1.3	1.4	1.4	1.7	1.5	1.7	1.6	1.8	1.6	1.5	1.6
	前向关联度	1	1	1	1	0.8	0.9	0.9	1	0.9	0.9	1
日本	后向关联度	0.6	0.6	0.6	0.6	0.6	0.6	0.5	0.5	0.5	0.5	0.5
	前向关联度	0.3	0.4	0.4	0.4	0.2	0.3	0.3	0.3	0.3	0.3	0.3
澳大利亚	后向关联度	1.3	1.3	1.2	1.5	1.8	1.8	1.5	1.3	1.1	0.8	0.7
	前向关联度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2

数据来源：“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 2018 ed: Principal Indicators.” OECD Stat.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TIVA_2018_C1#

表4 四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数

国家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印度	0.14	0.10	0.10	0.05	0.10	0.07	0.05	0.04	0.04	0.06	0.10
澳大利亚	0.21	0.19	0.20	0.17	0.20	0.21	0.21	0.22	0.19	0.20	0.21
日本	0.21	0.20	0.19	0.17	0.22	0.20	0.17	0.17	0.16	0.14	0.17
美国	0.18	0.18	0.18	0.17	0.19	0.17	0.16	0.17	0.18	0.18	0.19

数据来源：“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 2018 ed: Principal Indicat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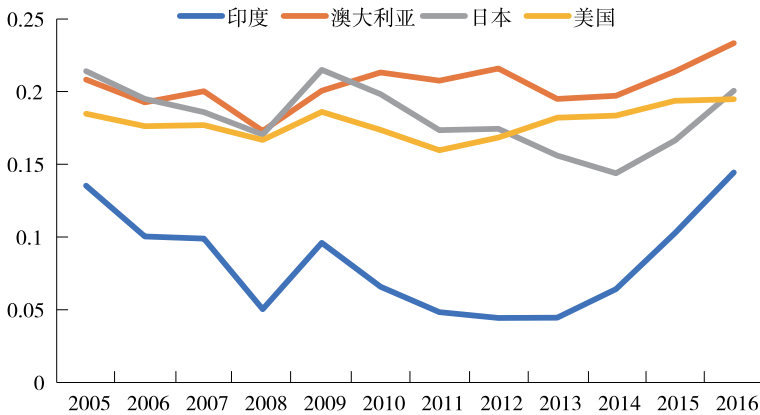


图1 四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关系变化图

数据来源：“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 2018 ed: Principal Indicators”。

根据测算结果,结合印度与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的贸易和投入—产出结构,可发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印度与三国的产业关联主要集中在能源、钻石、医药、纺织品等产业中,存在着明显的分工互补关系。首先,印度基本位于三国的产业下游位置,依赖于三国的“上游供应链”,包括产业的研发、生产所需原料、设备等。其次,三国还是印度的主要出口市场,尤其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最大出口国”。最后,从价值链位置角度来看,相对于其他三国而言,印度基本上位于价值链的“生产端”,印度将主要承担“生产”任务,其增加值含量、技术投入程度较低,并深受上游供应和下游需求的制约。因此,相对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印度的角色主要表现为:作为价值链的“生产者”,承接三国的上游供应,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升级,最终把制成品和最终服务出口至三国的销售市场。

三、印度参与“印太”建构的局限性

印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低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充当着“生产者”的角色,上接原料供应,下接需求市场。这种“生产者”的角色需要印度自身有着强大的生产能力,能够实现区域供应链和需求链的有效衔接。然而在现实中,印度承担“生产者”角色的能力较为有限。

(一) 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完整

从印度的增加值结构来看,印度的产出含有大量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国外增加值”,从而造成印度的价值链位置显著低于其他三国。综观印度与三国的产业关联结构,可发现印度“生产者”的任务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下的加工业,形成了“原料—加工—制成品”的循环模式。即从三国进口初级产品或半制成品,并以此作为生产资料,对其进行加工制造,出口可供消费的制成品或者能够进一步生产加工的产品部件。加工业本身具有“技术依赖强、人力依赖弱”的特征,预示着印度的区域“生产者”角色主要建立在国内“技术密集型”产业之上。这就说明,依托于加工业对技术的投入,其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均远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成品油、钻石加工、药品就是这种技术密集型产业下的产物,这一贸易结构使印度在表面上具有了“发达国家”的特征。可以说,以“加工业”为核心,有望形成印度对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路径。

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印度参与“印太”价值链的局限性,即制造业整

体发展的不充分限制了印度生产能力的发挥。印度制造业最大的困境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缺失，国内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大量使用劳动力的生产活动，通过劳动力的大规模投入而降低对技术、资本、机械等非劳动力要素的依赖。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单位创造增加值能力较低，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却是整体工业活动的基础，其本身具有强大的产业联动作用，既能够为其他产业活动提供上游供应，也能够创造下游的消费市场。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也是国内完整“产业生态系统”的基础。目前，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缺失与产业生态系统的不完整，导致了印度经济两大结构性问题：其一，印度广大的人口资源并未转化为可供生产的劳动力资源，反而流向了农业和服务业，致使印度工业就业比例仅占24%左右，远低于农业和服务业（见图2）；其二，在印度的GDP结构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3%下降至2019年的13.6%，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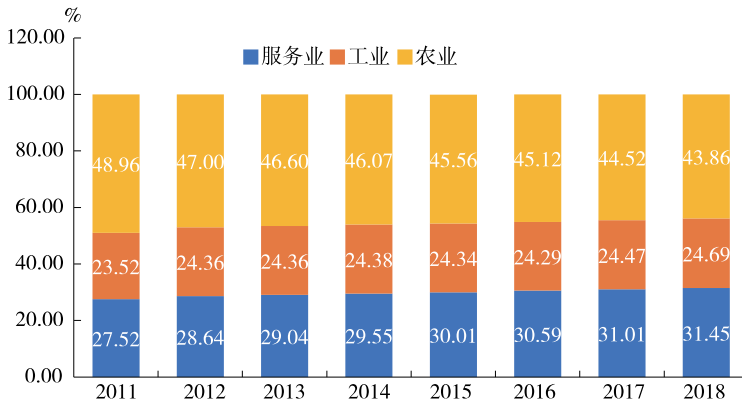


图2 2011~2018年间印度就业结构变化图

数据来源：“India: Distribution of the Workforce across Economic Sectors from 2009 to 2019,” Statista India, July 23,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1320/distribution-of-the-workforce-across-economic-sectors-in-india/>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缺失、国内产业生态系统不完整的制约下，印度的“生产者”角色只是局限于个别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加工环节，不能参与规模更大、产业链覆盖更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产业机构畸形化的后果，是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的全球价值链布局中，印度处于相对边缘

印度对“印太”的参与、局限与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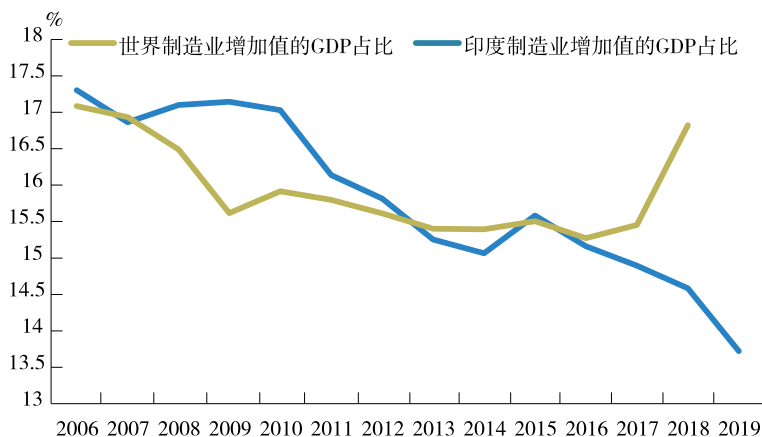


图3 2006~2019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在GDP占比变化图

数据来源: Wor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MANF.ZS?locations=IN-1W&.view=chart>

的地位。根据三国的增加值贸易活动，三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产业集中于化学和非金属矿产品、电子、机械、运输装备等，三国既是技术、原料、高端装备的上游供应方，也是下游最终产品的需求方，而负责具体生产的中间环节则交予了海外的生产型国家。具体来看，这些生产环节均需要劳动力的广泛投入以及配套的底层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相互支持，具有单一分工环节“专业化”与整体产业链“规模化”的双重特征，以保证组装、配件、加工、塑型等生产环节的合理搭配与有效运行。对于印度来说，虽然自身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能够在能源、医药、基本金属等领域形成“专业化”分工，但是其国内产业生态系统的缺乏限制了整体生产的规模效应，不仅阻碍了自身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规模扩大，而且使自身难以涉足运输、机械、电子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因此，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印度由于国内制造业能力的不足，在三国的全球增加值贸易中并没有优势，甚至在运输装备、电脑电子装备、机械装备三个主要制造业中占比均位于10名开外，这就说明印度并非三国的核心伙伴（见表5、表6）。

总体来看，印度的“生产者”角色，仅局限于个别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广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由于印度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完整而缺乏生产能力。这就导致印度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全球增加值贸易布局中，位置相对边缘。

表5 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增加值贸易关系（出口）

（单位：百万美元）

美国出口前五项产品	增加值	对印度出口	占比（%）	排名
化学和非金属矿产品	262827.5	5000.5	1.90	10+
运输装备	235583.6	2052.6	0.87	10+
电脑电子装备	103122.6	1538.1	1.49	10+
机械装备	96063	1167.9	1.22	10+
基本金属	87718.2	6957.5	7.93	4
日本出口前五项产品	增加值	对印度出口	占比（%）	排名
运输装备	151302	1444.8	0.95	10+
电脑电子产品	100507.1	990.8	0.99	10+
化学和非金属矿产品	88000.5	1770.4	2.01	9
机械装备	85824.9	1285.2	1.50	10+
基本金属	52859.8	2701.1	5.11	6
澳大利亚出口前五项产品	增加值	对印度出口	占比（%）	排名
基本金属	22912.7	2592.7	11.32	2
食品饮料	17506.1	80.5	0.46	10+
化学和非金属矿产品	7530.4	287.7	3.82	6
电脑电子产品	3516.1	64.2	1.83	10+
运输装备	3242	22.3	0.69	10+

数据来源：“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 2018 ed; Principal Indicators”。

表6 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增加值贸易关系（进口）

（单位：百万美元）

美国进口前五项	增加值	从印度进口	占比（%）	排名
运输装备	368171.7	2191.2	0.60	10+
电脑电子产品	329277.6	1743.5	0.53	10+
化学和非金属矿产品	296512.7	13985.7	4.72	6
纺织产品	145065.5	9293.4	6.41	3
基本金属	143032.4	4870.1	3.40	7
日本进口前五项	增加值	从印度进口	占比（%）	排名
化学和非金属矿产品	82030.7	2197.7	2.68	10
电脑电子产品	81969.7	154.5	0.19	10+

印度对“印太”的参与、局限与展望

纺织产品	41438.1	523	1.26	6
食品饮料	37241.6	542.8	1.46	10+
其他制成品	37160.8	985.6	2.65	6
澳大利亚进口前五项	增加值	从印度进口	占比 (%)	排名
化学和非金属矿产品	41457.9	1787.7	4.31	6
运输装备	29957.9	188.4	0.63	10+
电脑电子产品	29267.9	136.1	0.47	10+
机械装备	16354.3	150.6	0.92	10+
基本金属	14229	228.2	1.60	10+

数据来源：“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 2018 ed; Principal Indicators”。

(二) 国际产业“替代”能力不足

在国际层面，一国为了改善国内产业格局、提升制造业生产能力，需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产业转移是全球价值链下各国产业互动的表现形式。产业转移的前提是全球分工体系下生产环节的空间分割，位于各产业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根据各国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布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 and 地区。在这一背景下，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分工逐渐由“行业间分工”转变为“生产环节的分工”，所谓产业转移也依托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差异而出现生产环节的跨国变迁，形成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配在不同国家的格局。

近年来，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正在东亚地区上演，表现为东亚价值链的部分生产环节从中国转移至周边国家。本次产业转移存在三个独特性：其一，本次产业转移的驱动力在于大国之间的博弈，背后蕴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扩张、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区域国际供应链体系的重构等因素。多个企业为了规避关税、供应链断裂、技术脱钩的影响，相继把过去在中国的生产环节迁出，这种迁出行为具有对中国价值链位置的“替代”效应。其二，本次产业转移的催化作用来源于新冠疫情，在新冠疫情以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出于对国际供应链“安全性”的担忧提出了生产网络的“分散化”配置。经济学家智库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在 2020 年 5 月发布的报告中称：“新冠肺炎疫情将推动更多公司的生产部门移出现有的供应链体系，进而建立一个新的亚洲供应链网络，该网络一

方面将不再以中国为中心，另一方面也更加多元化。”^①其三，本次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生产驱动型”价值链，即价值链主导型企业或跨国公司巨头依托于生产环节外包的模式，形成跨国的垂直分工体系。生产驱动型价值链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机械装备等多个产业，中国是生产环节的主要承接国。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下，主导企业推动了生产环节的空间变动。

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为印度提供了承接中国生产能力的机遇。2020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中国台湾富士康与和硕公司等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宣布在印度建立代工厂。这种现象也为印度扩大产能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从数据上看，2015~2019年间，美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消费国，机械（HS 84）、电子（HS 85）和运输工具（HS 87）构成了美国的前三大进口产品，进口比例约占总进口额的40%，而印度在这三项产品的对美出口在五年内分别增长了14%、13%、25%，^②这三项产品的出口增速也位居印度整体对美出口的增速前列。可以说，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东亚地区的分工环节正在由中国向外扩散，而印度则是这种扩散的潜在承接国之一，这将为印度改善自身制造业水平、提升“生产者”能力、增强与“印太”国家价值链合作提供机遇。

但是在现实中，印度几乎不能“替代”中国的位置，也难以大规模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首先，在规模和体量方面，印度的生产能力完全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近年来印度虽然吃到不少中美贸易摩擦的红利，对美国的出口速度也在大幅上升，但是从总量上看，在上述美国三项主要进口产品中，2019年美国从印度的进口比例仅为0.7%、0.5%和0.6%，作为对比，美国三项产品从中国的进口比例则达到了25%、36%、4.8%。^③可以说，尽管印度贸易增长速度有所提升，但是短期内仍然无法弥补中印在规模和体量上的巨大差距。其次，从产业链体系来看，这种工厂企业搬迁的行为具有产业“溢出”或“扩散”的性质，中国依旧掌控着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与之相比印度国内并没有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这就导致印度只是承

^① Chloe Taylor, "Coronavirus Will Reverse Globalization and Create Regional Supply Chains, Economists Predict," CNBC, May 13,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5/13/coronavirus-will-undo-globalization-make-supply-chains-regional-eiu.html>

^② Trade Map. <https://www.trademap.org/Bilateral.aspx?nvpm=1%7c699%7c%7c156%7c%7cTOTAL%7c%7c%7c2%7c1%7c1%7c1%7c1%7c1%7c1%7c1%7c1%7c1%7c1%7c1%7c1>

^③ Trade Map.

接了相关产业的低端环节。这些环节更多地靠近最终消费，印度在对美国出口增长的同时，需要对中国上游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依赖。从上述三项产品来看，印度对美出口增速扩张的背后，是对中国大量进口的需求，印度三项产品的中国进口比例在2019年分别达到了31%、39%和24%，^①从而构成了“从中国进口—印度加工—出口美国”的循环模式。最后，新冠疫情的暴发对印度经济造成了重创，更为严峻的是，印度的疫情防控并不理想，这就导致众多的工厂企业无法正常开展生产。为此，有不少属于印度的生产订单，反而又回流进了疫情防控较好的中国。可以说，新冠疫情造成的不确定因素进一步打击了印度的生产能力。因此，尽管在中美贸易摩擦的环境下，印度有着相对良好的外贸环境，但是印度由于自身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缺乏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并不能根本性地改善制造业发展水平薄弱的困境，更不能在区域分工体系下代替目前中国的位置。

综上所述，印度作为价值链的“生产者”，其生产任务主要集中于自身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下对初级产品的加工，并没有实现整体制造业的联动效应。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印度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落后，缺乏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导致印度不能满足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对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任务需求，从而在三国的全球价值链布局中印度的位置相对边缘；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受制于生产规模、产业链体系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印度不能有效抓住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未能实现区域内生产分工的扩大，其作为“生产者”的能力依旧存在诸多局限性。

四、印度参与“印太”建构的展望

根据印度国内产业的发展梳理可发现，由于国内产业生态系统的不完整，造成印度制造业呈现畸形发展。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个“印太”支点国的产业合作局限于个别技术密集型产业，其“生产者”的角色定位也仅限于能源、钻石、医药等产品的加工。而对于更广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印度的参与程度较浅，这一结构性缺陷势必会降低印度对“印太”区域内的经济参与力度。为了改善这一结构性问题，印度将采取两

^① Trade Map.

种措施：对内实行经济改革，大力发展制造业；对外实行保护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为本土产业的成长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国内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印度正在通过“莫迪改革”补充制造业短板。2019年5月，莫迪成功连任，从而开启了莫迪政府的“2.0时代”，并在第二任期的施政纲领《新印度战略》中提出2018~2023年实现印度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的目标。^①莫迪经济改革最大的影响在于振兴“制造业”。在《新印度战略》中莫迪政府特意提到要在2022年实现制造业增长率翻一倍的目标。为此，莫迪政府在上任以来提出一系列改革制造业的框架和措施，包括建设“五大工业走廊”、^②改善基础设施、降低运输成本、统一税制等。莫迪政府寄希望于改革，争取利用“印度制造”将印度打造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这对于印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来说，有利于扩大生产端的能力，确保自身的“生产者”角色。但是，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莫迪经济改革并未根本性地改变印度制造业的落后局面，其原因主要包括三点。第一，国内土地制度的限制。长期以来，印度土地私有制制约着工业用地的的发展。虽然莫迪政府出台过新的“土地征收法”，尝试推动国内的土地所有制“流转”，但是这一法规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拥有土地农户的利益而并非为了推进城市化、工业化，^③从而对土地征收制定了高昂的补偿费用与繁琐的行政流程，致使印度工业用地的成本居高不下。第二，劳动力资源的限制。在莫迪经济改革中，印度政府颁布了新的劳动法规，并制定了劳动力技能培训方案，但这些措施未能触及印度劳动力结构的本质问题，即如何把人口优势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促进劳动力向制造业领域流入。^④而印度国内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进一步限制了人口的跨阶层流动，致使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并未及时转化为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下所需要的初级劳动力资源更加匮乏。第三，资金短缺的限

^① “Strategy for New India,”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ing India, November 2018, p. 7. https://www.niti.gov.in/sites/default/files/2019-01/Strategy_for_New_India_2.pdf

^② 五大工业走廊，即德里—孟买工业走廊（DMIC）、金奈—班加罗尔工业走廊（CBIC）、东海岸工业走廊（ECEC）、阿姆利则—加尔各答工业走廊（AKIC）及班加罗尔—孟买工业走廊（BEMC）。

^③ 刘小雪：《从印度经济增长瓶颈看莫迪改革的方向、挑战及应对》，《南亚研究》，2017年第4期，第142页。

^④ 施丹辉、黄郑亮：《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内部制约因素分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6期，第132页。

制。资金是制造业发展的必要动力，吸引外资也是莫迪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国际资本对印度的投资逐年扩大，但是从细分行业来看，印度制造业并不是外资的主要青睐对象，更多的资金反而流向能源、电信与服务业领域中。同时，莫迪经济改革通过“废钞令”的实施加紧对国内资金流通的管控，这虽然能够治理国内的腐败、洗钱等“黑色经济区”，但是在客观上也打击了以现金结算为主的印度中小企业和个体商户，扰乱了部分制造业的资金收支体系，为国内经济体系带来了不必要的混乱，加剧了制造业的融资压力。

从国际角度来看，印度需要构建有利于国内产业发展的国际贸易环境。一方面，由于印度自身缺乏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国内尚不能形成有效的供应链体系，生产原材料多依赖进口，这也是印度贸易赤字持续多年的主要原因。为了遏制贸易赤字、保护国内市场并完善国内供应链，印度需要采取必要的贸易保护政策，高关税是其中一项措施。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18年印度平均税率为50%左右，其中农产品税率高达113.1%，非农产品税率为36%。^①印度的关税水平，超出了同期中国、巴西、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的关税税率。为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指责：“印度长期以来对美国征收高关税，他们是关税之王(King of tariffs)。”^②与此同时，印度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趣也较为冷淡。2018年以来，印太区域内的两大自由贸易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印度均未加入。其原因就在于两大贸易协定对市场开放的要求并不符合印度对国内产业保护的实际需要，也缺乏协定内最终消费国的角色。尤其是美国角色的缺失，导致两大协定内参与国的生产能力与最终消费比例失衡，这对于可望增加出口、改善贸易赤字的印度来说并不符合实际利益。另一方面，在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印度对国际产业合作持“开放”态度，试图为印度制造业争取更多的产业分工机遇，以便更有效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在“印太”框架下，印度对区域经济的参与诉求表现为更广泛地参与区域生产网络，尤其是对区域供应链层面的嵌入，为“印度制造”提供更多的下游市场空

① “Tariffs and Imports: Summary and Duty Ranges.” WTO. https://www.wto.org/english/press_e/statis_e/daily_update_e/tariff_profiles/IN_e.pdf

② “India-US Trade: Is Trump Right about India’s High Tariffs?” BBC, September 23, 201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48961235>

间，从国际需求端推动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在印度放弃 CPTPP 和 RCEP 的同时，2020 年 4 月美国发起建立一个由“值得信赖的伙伴”组成的“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EPN），其中印度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越南将是这一计划的主要成员国；^① 同年 9 月，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三国主管对外贸易的部长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了加强区域供应链适应力方面的合作，并在随后的联合公报中提出要根据近期的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建立“具有弹性的印太区域供应链”（Resiliency of Supply Chain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SCRI）。^② 这些规划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区域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重构”性质，不仅符合印度扩大区域内产业分工的追求，而且与“印太”战略在经济上“去中国化”的目标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印度参与“印太”的核心任务是要补齐国内制造业的结构性短板，接轨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体系，以保障自身在“印太”下的“生产者”角色。在国内层面，印度试图通过莫迪经济改革，扩大“印度制造”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能力；在国际层面，印度一方面采取高关税措施保护国内制造业市场，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印太”下的产业合作嵌入区域供应链体系，为制造业寻求更大范围内的产业分工机遇。

（编辑 毛悦）

① Humeyra Pamuk and Andrea Shalal, “Trump Administration Pushing to Rip Global Supply Chains from China: Officials,” Reuters, May 4,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usa-china/trump-administration-pushing-to-rip-global-supply-chains-from-china-officials-idUSKBN22G0BZ?edition-redirect=ca>

② “METI Minister Kajiyama Attended the Australia-India-Jap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Japanese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September 1, 2020.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ress/2020/0901_002.html

of U. S. -India relations that is tilting towards high-level and more sophisticated cooperation, including multilateral initiatives. As joint exercises between the U. S. and India gradually become a more mature element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complexity and intensity of the coordination involved in the exercises has increased, which in turn has enhanced the depth and sophistication of the U. S. -India relationship. Turning to how the development of joint U. S. -India military exercises has impacted the broad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t has functioned to increase India's dependence on U. S. military hardware and served to integrate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t the tactical level. This has in turn enhanced U. S. -India military mutual confidence and strengthened U. S. -India coordination vis-à-vi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KEY WORDS: U. S. -India Relations;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Military Dependence; Military Mutual Confidenc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A Global Value Chains Perspective on Outlooks for and Limitations of Indi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By Huang Zhengli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do-Pacific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a geographical concept into a geo-political strategy. A key facto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will effectively progress is the relationship in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s between countrie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dia's input-output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Australia makes up the Indo-Pacific industrial chain. India's role within this chain is largely as a "producer", receiving raw materials and providing for market demand. However, due to structural flaws and limitations within India's manufacturing sector, India's role as a producer is forced to limit in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which not only places India at the margins of the core industry in the Indo-Pacific, but also makes it difficult for India to receive industry transform from within the region. These are key limitations on India's economic particip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and they also imp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t present, India is implementing economic reforms targeted at overcoming its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on the backward state of its industrial capacity.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ndia is protecting its domestic market, while build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onnection as a means of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ke in India".

KEY WORDS: India; Indo-Pacific; Global Value Chains; Industrial Structure;

Modi Reforms

New Tendency in Quadr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U. S. ,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and Impacts on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do-Pacific”

By Zhang Genhai

ABSTRACT: Since Australia, the U. S. and Japan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vast area betwee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the Indian Ocea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as a means of expanding its strategic reach in the Indo-Pacific, the U. S. has pulled India, Japan and Australia into strategic dialogue, advanc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Quadrilateral cooperation. By enhancing the platform to the QUAD+, the U. S. ,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have expanded the scale of military exercises, increased the quantity of high-performance weapons, and adopted other means of constructing a long-term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The reason for this is not only that the U. S. wants to build a strategic order in the Indo-Pacific under its leadership, but also because these four states all share a strategic intention to contain China's rise. The new trend of strengthening the strategic combination of the U. S. ,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in the Indo-Pacific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not only intensifies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acto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also has further resulted in escalation of the disput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has meant much greater complexity with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neighboring environment, which is disadvantageous for regional peace or stability. As the state with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should adopt a positive and preventative approach, while formulating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safeguar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KEY WORDS: Indo-Pacific; US-Japan-India-Australia;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South China Sea Security; Strategic Combination